军队建设

没有人才，什么战争都打不赢

□ 平兴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眼于开发管理好军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强军之要，人才为先，现代战争打的是人尖战略、拼的是体系对抗，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基础要素是人才，未来战场的决胜密码也是人才。

经过多年努力，我军人才建设各方面相关政策日趋完善，官兵素质整体跃升。但客观来看，受基础、理念、环境、机制等因素制约，还存在一些明显不足。比如：重履历轻能力，把任职经历作为选人用人必备条件，忽视实际能力素质考量，有些干部综合素质好，却仅仅因为缺少某一项任职经历而得不到重用。重年龄轻实绩，片面追求干部年轻化，简单以年龄“划杠”，忽视德才标准、身体素质、工作实绩等依据，既降低了选人用人标准，也把一批优秀人才卡在了“门外”。重用人轻育人，有时把能力素质偏弱的同志放到领导岗位，只是“扶上马”，未能“送一程”，造成个别干部或是思想“跑偏”违纪落马，或是能力“瘸腿”难担使命。重眼前轻长远，只管用的顺手，不愿安排对外交流、求学深造、基层锻炼等，造成人才队伍整体潜力不够、活力不足、适应性不强。重库选轻海选，眼光只盯着后备库中几个对象，突破不了地域、单位、行业、兵种、身份等诸多限制，不能在更大范围通盘遴选，有时因为人选不多，为应付岗位需要而“因人设框”等等。

上述问题直接影响官兵人心聚散，制约部队建设发展。当前，国防和军队全面深化改革在即，伴随编制精简调整，将产生一大批待分流安置的干部，客观上为择优选人用人、改善人才布局提供了有利条件。应针对问题、抓住机遇，积极发现人才，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六对辩证关系。

“年轻”与“优秀”的关系。“苟得其人，虽年轻必举；苟非其人，虽年尊不授。”干部选任时，应破除“年轻中选优秀”的惯性思维，创新“优秀中选年轻”的鲜明导向，不能为了干部年轻化，就对年轻干部降格以求，而要把德才兼备作为首要准绳，既要防止一些优秀人才因为年龄即将“踩线”而被“拒之门外”，从而丧失信心干劲，又要避免少数年轻干部仓促上任甚至“带病上岗”，出现拔苗助长的问题。实际操作中，“优秀”的标准界定不像年龄那么简明客观，需要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下大力气量化评估，最大限度地保证“好中选优、优中选青”。

“经历”与“能力”的关系。经历是干部工作经验的体现，但并非任职的必备条件。一些干部恰恰因为优秀而被长期留在一个岗位上，虽在履历表上不占优势，但始终埋头苦干，通过实践、书本和向他人学习经验，同样具备优秀的综合素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发展理念，军队人才建设也应创新思维、拓宽思路，敢于打破“唯经历论”，既坚持能力需求，又考虑履职实际，大胆提拔使用能力卓越而又扎根岗位的人才，扩大择优选才的“分母”，让大多数干部看到希望，人人都有希望，部队建设就有希望。

“显绩”与“隐绩”的关系。用人得当，首先知人要深。当前考察干部有的还是“熟悉的凭印象、不熟悉的凭感觉”，缺乏全面考量。黄彭年在其著作《选将论》中提出“五将”层级，由低到高分别为勇将、谋将、才将、贤将、大将，前四级分别凸显了一名将领在胆气、谋略、才能、品德等方面的显绩，而大将标准“勇而能抑、谋而能决、才而能敛、贤而能让”，既具备前四个层级的所有优点，却又都是难以直接考量的隐绩。识才贵在全面，要观其在大是大非和重要政治关口面前的抉择立场，知其党性灵魂；观其对待进退得失、名利诱惑的态度，知其品质情怀；观其理论素养、人文修养和对重大问题的思考见解，知其思维层次；观其处理敏感棘手问题的策略办法，知其能力水平；观其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的勇气担当，知其德行作风。此外，还要放眼其领导部队一段时间内的建设全过程，让发展成果和官兵公论说话。

“长处”与“短处”的关系。现行后备干部制度操作起来是“短处排除法”，先针对岗位空缺，从后备库中框选若干干部，再比照任职要求逐个排除，这样筛选出来的同志基本条件一般是具备的，但是否最合适则不得而知。当前应抓住改革契机，走“库选与海选结合”的路子，采用“长处决定法”，力避“矮子里拔将军”的情况。填补空缺岗位先从后备库中选拔，若合适人选就突破库选范围，把符合条件的干部逐个贴上“优缺点标签”，师以上干部在战区范围、团职干部在军级范围统一遴选、择优使用，让更多人站上舞台。

“严格”与“破格”的关系。我军现行干部政策历经多年完善，本身科学合理，但实际操作中变通现象时有发生，有时官兵戏称“干部工作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严重影响了党委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执行干部政策必须“严”字当头，严格树立军队“好干部”标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让程序规则和集体意志成为权力的“笼子”，彻底铲除公权私用、买官卖官的“土壤”，让人才成长始终在阳光下运行。在严格基础上，还要敢于“破格”，尤其是对那些平时敢担当、战时敢亮剑，关键时刻不辱使命的优秀人才，要用足用活政策，不搞唯票取人，使其“小步快跑”，尽早发挥作用、胜任岗位。

“流向”与“导向”的关系。“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强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人是战斗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尤其是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人才流向直接影响战斗力的资源比重，用人导向直接决定战斗力的生成质量。抓人才队伍建设必须紧贴军事斗争准备现实，把流向控制好，把导向树立好。如果一个单位一线岗位严重缺编，清闲或驻城市岗位人浮于事，说明人才流向没有重基层、重实干；如果成长进步没有向出色完成使命任务的同志倾斜，说明用人导向没有直指战斗力；如果优秀干部上不来，基层交流下不去，说明党委用人没有走开能上能下的路子，说到底就是领导智慧不足，单位风气不正。干部政策改革，必须先形成健康有序的干部流向和能战者上的正确导向，让领导机关接地气、基层一线有奔头、偏远艰苦地区有希望、埋头苦干的老实人有回报，保证还官兵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让更多有志之士、有识之士、有能之士投身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科技与社会

2015美国创新新战略

□ 李　楠

2015年10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最新版《美国国家创新新战略》，提出了支持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新政策。文件指出，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创新者的国度，创新是其经济增长的源泉。2014年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创造就业增速最快的一年，美国政府此时提出创新战略，旨在未来十年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以创新推动私营部门产业发展，以创新拉动国内就业，进而为美国人民提供一个创新性政府。最新版创新战略，是奥巴马任内第三次发布关于支持创新的国家级战略性文件，显示出美国政府对创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

2015年的美国创新战略共有六个部分，包括三大创新要素和三大战略举措。三大创新要素指的是投资创新生态环境基础要素、推动私营部门创新、打造创新者国家，三大战略举措指的是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和持续经济增长、推动国家优先领域突破、建设创新型政府。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三大战略来进一步激活三大创新要素，以此创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2015年的创新战略强调了营造创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所谓“创新生态环境”，是指那些能够支持将新理念引入产品、生产过程和服务的各种资源、机构、基础设施和人才。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个关键环节，美国都有较大优势，如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根据最新排名，全世界排名前20所研究型大学中，16所都在美国。同时，美国的创业风险文化使创新者们不断将新的理念推向市场。事实上，2013年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风险投资都流向了美国。美国经济也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最高的国家，占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另外，美国在全世界高科技制造领域占比27%，处全球领先水平。然而，2015年的创新战略也认识到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包括如何在几十年的离岸外包后重建其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公地”，以及如何将所有美国人和所有地区吸收到创新过程中。

创新发展需要社会支持，但在政府参与创新和参与程度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二战之前，无论是在经费投入上，还是在科技方向主导上，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都是私营企业。二战时期，出于战争的考量，美国政府重点资助原子弹等军事研究，由此产生了一批顶尖国家实验室。二战结束后，政府开始逐步干涉科学研究方向，并于1951年设置了总统科学技术顾问。虽然时至今天，从总经费投入上来说，企业所占比例仍居高不下，但在科研开发方向上，政府通过干预手段仍指引着美国创新体系前进的方向。

私营企业是美国创新的引擎，政府是创新的推动者。美国的私营企业和他们的创新成果都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成为了社会创新的主体。对于历来重视创新的美国政府来说，政府担当的角色应该是科技创新的保护者、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者、创新文化的倡导者以及具体科技创新与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而不是科技创新工作的具体从事者。到如今，美国的创新战略仍以企业为主，政府实行弱干预。这种弱干预主要通过提供恰当的政策指导和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来实现。为鼓励创新，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大对创新生态系统各基础领域的投入，如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投资于研发，鼓励学生主修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专业，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吸引高水平技术和投资移民，推进无线和宽带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等等。在这种创新生态环境中，学术研究界、产业界和政府三方通过密切合作形成了良好互动，为美国营造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国家创新体系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传统，鼓励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保障创新成果的法律法规，促进创新发展的研发教育投入和鼓励个人创新的社会环境，使美国成为一个创新型科技强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解读分析美国创新战略，对处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初期的中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奥巴马两届任期内，连续三次发布国家创新战略报告，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显示出本届美国政府对创新战略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文件开篇提到的那样，“今天全力发展创新的国家明天将拥有全球经济，这是美国不能放弃的优势”。相对于2009年和2011年的美国创新战略，2015年的美国创新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具体，着重强调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进一步聚焦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我们特约请“千人计划”专家邓兴旺撰文，文章针对目前我国农业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粮食自给率尚待提高的问题，提出应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选择符合中国国情或区情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民现代化，以科技为本，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走好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 邓兴旺

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依然漫长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有两个发展模式：规模化农业，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主要着眼于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基础上获得高效益；集约化农业，地少人多的国家如以色列、日本等，主要着眼于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

其中，美国现有耕地面积29.7亿亩，农业从业人口205.6万，占美国总人口的不到1%，但其人均农业产值高达8.98万美元。据美国农业专家估计，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外国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20%，出口约占世界粮食出口的40%。

以色列拥有的耕地约为640万亩，农民劳动人口约为12万，占总劳动力的3%左右，人均农业产值达3.64万美元。保守估计，以色列一个农业人口可养活90—100人。以色列农业经济效益显著，不仅每年向世界市场出口价值3000万美元的种子，还每年出口价值6亿美元鲜活农产品和6亿美元的加工食品，每年农产品出口利润达1.5亿美元。

中国目前耕地面积为18亿亩左右，农业从业人口约为2.8亿，人均农业产值0.34万美元。据测算，一个中国农民最多养活4名国人。目前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不足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约为70%左右，另外30%需要通过国际市场进口补充。相较之下，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差距显著，农业现代化之路依然漫长、艰巨。

农业现代化以科技为本

尽管实行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美国与集约化生产的以色列在经营形式和生产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两者却存在一个共同特点——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应用和推广。

从上世纪40年代的农业机械化到70年代应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农业生产自动化管理，以及后来在网络技术支持下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信息化，不断进步的农业科学技术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美国有20%的农场主采用直升飞机进行田间管理，有的甚至采用遥控拖拉机实行自动耕种；70%的农场拥有互联网接入技术，并建立了灵敏的市场信息反馈网络。大规模的机械化和信息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美国农场平均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同时管理耕地近3000亩，照料6万—7万只鸡、5000头牛，可以生产谷物10万公斤以上以及生产肉类1万公斤左右。美国农业高科技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始终高度重视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里的广泛应用，根本原因就在于经过生物技术改良的动植物品种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动植物的品质、产量和抗病性，从而可以大大地提高美国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

同样，以色列农业之所以在全球能名列前茅，主要是以色列历届政府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坚持不懈地执行了科技兴农的发展道路。虽然以色列是一个水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全国年均降水只有200 mm，但以色列建国以来农产品产量增长了12倍，而每亩土地耗水量仍保持原有水平，这与他们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息息相关。采用节水灌溉，每块土地可节水50%~70%。除了节水技术，以色列十分注重结合最新的科学技术开发培育作物新品种，他们利用生物技术和其他手段，不但培育出品质优良、抗病抗虫、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种子和种苗，还以先进的栽培技术指导农民种植，从而有效保障了以色列大田作物优质高产。

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选择符合中国国情或区情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美国与以色列现代农业发展的做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示，但由于我国农业发展的时代背景、资源禀赋、经济社会结构、体制环境、经营方式均与二者不同，简单复制二者的农业发展模式，非但难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反而有可能会产生诸多新问题。我们需因地制宜、灵活选择，在能实行规模化经营的北方平原地区，可以通过有效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来集中土地，推行机械化生产，实现规模经营；而地形较复杂的南方地区则可以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充分发挥当地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引进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和加快农民技能培训上下工夫，走劳动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农业道路。总之，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顺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促进农民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而不仅是正进行中的“中国城镇化”。中国农村的最终出路也在于就地现代化，农民就地得到教育、培训和就业，不仅能够让农民在当地安居乐业，减少大规模人口的盲目流动，而且能够有效化解当前城市教育、医疗、住房资源短缺等社会难题。因此，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基本的水、电、网络等现代化生活保障，让广大农村享受改革发展红利的同时，缩小城乡间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差距。特别是文化教育现代化方面可以先行先试，让城市的文化教育资源以同等的服务标准延伸到农村，着力改善农村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师资力量、教师待遇等。同时加强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建设，让农村孩子也可以随时随地上网，拓宽知识视野。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只有通过教育培养出新一代高素质有文化的新农民，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步伐，改革目前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使农科教紧密结合；打破目前以论文为核心的农业科技评价导向，引导科研人员实施选题来源于生产、成果服务于生产，制定以科研质量、创新能力和成果应用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按照工作岗位要求，以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及其转化率、项目管理水平、服务农业的实际成效、农民满意程度等多角度评价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同时加大农业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食品生物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与成果转化，走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高度重视国家政策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作用。目前国家对农业支持政策的效能有待提高。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以下简称农业“三项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大大降低。在多数地方，农业“三项补贴”已经演变成为农民的收入补贴，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或者不种地也能得到补贴。而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不仅要交自己承包耕地的费用还很难得到政府的补贴支持。建议今后政府集中财力物力，在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积极引导并大力支持，为农业的现代化打下更为有利的基础。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6.07亿吨，连续第十一年实现增产。但在“十一连增”的背后，却是农业土壤与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的窘况。据统计，中国拥有地球上7%的耕地，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却是全球总用量的35%。目前在全球高氮化肥用量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的“增肥低增产”类型。单纯地追求农业高产连增会导致耕地质量下降、高化肥用量和环境污染加剧，这无疑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无法保障民族永久性粮食安全。中国农业现代化一定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要用科技手段解决重金属污染、白色污染、畜牧污染、秸秆还田等问题，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建立起良好的农村生态系统。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使我国有限的耕地始终具有充分满足人们对食物需求的生产潜力。因此，根据市场的变化与需求灵活安排调整农业生产，甚至在适当的年份（如国际粮食低价时）通过加大粮食进口量解决国内粮食需求，以便实现土地轮休，从而积蓄更大的生产潜力，有效保障土地生产的可持续性。

科技战略